

■新作聚焦

刘亮程长篇小说《长命》:

赋予“生”宽广的厚度与绵长的深度

□王晴飞

《长命》是刘亮程的60岁之作。在《本巴》中,刘亮程改写江格尔史诗,创造出一个天真的本巴世界。这也是一个人类少年时期的世界,“那里人都二十五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一切都充满童年与童真的勃勃生机,“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一切都来得及。那时的人还顾不上考虑衰老与死亡。但是每个少年最终都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命定的终点。当人类走过了中年,迈进衰老,甚至开始接近终点,遥望生命背后的无尽废墟,该如何自处?当意识到生命随时可能被黑暗的死亡中断,又可以赋予短暂而脆弱的“生”以怎样的意义?我们要怎样抵御时间的侵蚀和生命终结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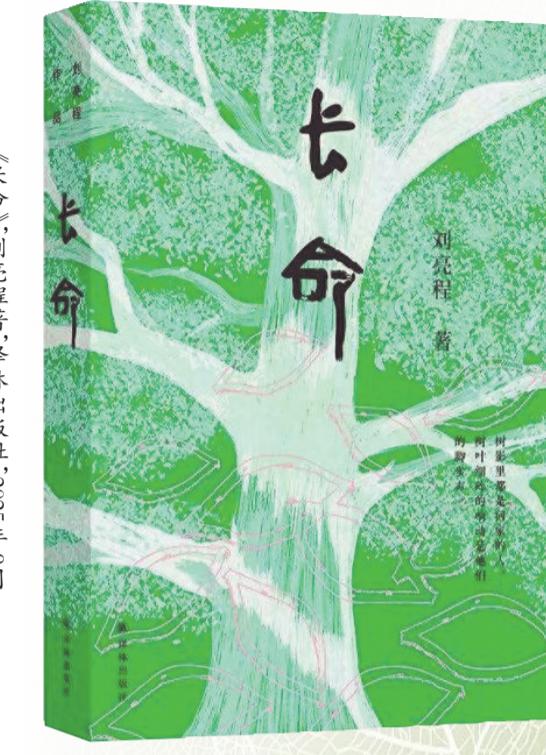
这是中国现代新文化没有教给我们的。新文化是青年文化,也是“生”的文化。自中国开始“现代”以来,我们一直学习的是怎样做少年、怎样做青年,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怎样做中年和老年。新文学作品的主角,也总是青年,老年人倘若不能充当青年的保护者,与时俱进,便毫无意义,只能随顽固的传统一起被毫不怜惜地抛弃。“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从民族国家层面来看,最急迫的冲动是怎样在新的世界格局里不被淘汰,“生”存下来;从个体角度而言,则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如何在新的社会里合理地生存。新文化教给我们怎样更好地“生”,没有教给我们怎样体面地老和死。

在现代社会里,传统的知识与信仰体系逐渐解体,个体从古老的“家族”共同体中剥离。个人只为自己负责,这意味着自由、独立、解放,但是个体的“生”也从更广大的共同体的“生”中游离出来,短暂的“生”在恒久的“死”的阴影里,将面对整体性丧失带来的荒诞与孤独。

当中国社会已经相对充分地进入“现代”阶段,新文化也从勇猛激切的青年时期走向中年,我们面临的问题,或许不再是要不要“现代”,而是要怎样“现代”。此前,被现代文明与科学精神“遮蔽”的本土传统文化,也将从封印中脱身,参与到新的“现代”的创造中。

在60岁那年(2022年)的一次访谈中,刘亮程谈到自己对生命、时间与死亡的感受。在他看来,生命是自然过程,生老病死在人和动物之间并无区别,但是,“我们的文化能让我们将死亡变得更有尊严、有仪式感”……乡村文化体系也在告诉我们这些。土生土长,土在哪?在家乡,在祖坟。何以安?归去族谱,归去宗祠,跟祖先在一起自然安了。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只有土了,可能以后连土都没有”。《长命》要说的正是永远活在25岁的本巴人不必考虑的“怎么去死,死了到哪去”的问题。在《长命》里,刘亮程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死后去向哪里,一是在死的阴影下生的意义何在。

《长命》中的世界,与刘亮程此前小说中的世界有相通之处,都是人鬼杂居而各安其分,生死相接而自有疆域。世间与冥间虽然分开,却可以相通。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长命和魏姑从事的分别是家传的医生与神婆两种职业,前者养生,后者送死,前者关心人的肉身,后者安妥人的灵魂。这从人物名字上也可以看出,“长命”自然致力于延长人的寿命,“魏姑”之“姑”,可见她是个神婆(姑子),所姓之“魏”则寓意委身于“鬼”,可以在人“鬼”之间传递消息。巫医原本同源,但是在现代科学昌明的世俗社会里,二者显然是不均衡的。医直接为生者服务,适应的是世间法;巫处理的是魂灵的事,游离于世间法之外,无法验证,更不可能建立统一而规范的客观标准。所以,庄严、庄重的寻求生死意义的民间职业,在强大的世间法的逻辑之下会被视为“封建迷信”。在小说临近结尾处,魏姑因看风水讲迷信、阻碍村民搬迁受审,被关押三年。在牢房中,教育犯人的红色标语,“像法力无边的符”,屏蔽了魏姑与鬼魂的沟通,这红色标语,便是世间法的代表。魏姑后来“完全被改造好了”,世界只剩下了“生”时短暂单薄的一面。



实际上,“神性”的失去,早已是注定的事。“神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基于传统的整体性的文化与信仰体系,生长在“以前”的生死并未截然分离的社会土壤里,也在现代科学理性精神要“祛”的“魅”里。传统文化与信仰体系的解体,在小说中有两个表现,一是关公庙的变迁,一是钟的破碎。

很长一段时间里,关公庙都承担着重要的社会信仰功能。在小说人物长命的经验中,有两次变化。一是他小学一年时,庙宇变为教室,关公被老师取代,暗示着现代知识启蒙覆盖了传统的民间信仰。在长命二年级时,老师也被“打倒”,作为行政干部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拆了关公像,斥为“草包”,使其神性剥离,只剩下了泥塑身体的物质属性。

“钟”则象征着过去信仰的整体。此前,每个地方有自己的钟,驿站和泉眼,所有的钟声相互呼应、次第传播,沟通生死,可以召唤故去的先人,给死去的魂灵铺就回家的路。在长命出生前五年,石人子庙的钟被打烂融化。破碎后的钟,被翻砂制成寻常人家的各种物件,“一口钟的宏大声音碎裂成无数的小声音”,预示着世界的整体性随之失去,传统信仰化为零,只以碎片的形式点缀于现代知识体系之中。

在整体性破碎的世界里,鬼神不再存在,死成为生的强行中断。死后的虚无,也削减乃至剥夺了生的意义。长命发愿铸钟,正是要重建传统的整体性,回到那个“宏大”的过去,回到人与鬼、生与死、现世与信仰浑然一体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里,死不是生的停止,而是生命形式的转化。“无神”后的魏姑说,“以前我看见人世有两层,地上活一层,地下活一层。地下活的人多,那一层厚,叫厚土。地上活的一层薄,人再多再热闹,也就从生到死那样薄。这浅薄的人世幸亏有厚土里先人的魂托着。”所谓“地下活一层”,便是“死”也是另一种“生”。在死的衬托之下,“生”变得厚重。而当“死”被现世的“生”压倒,“生”也就因有限而浮薄。

人“鬼”杂居而各安其分的世界,赋予“生”以广度与厚度,而《长命》中理想的生命还具有长度与深度。在宗法制的中国家族血脉传统中,“村里有宗祠,家里的供桌上有关宗灵位”,“一个人的命连着祖先和子孙的命,每个人都在祖先那里有千岁,在子孙那里有万代”。人不仅活在自己短暂的一世里,

《长命》重建的是生命的神性与中国式家族的血缘传统,赋予“生”宽广的厚度与绵长的深度。作家在祛魅的时代寻求复魅的可能,尝试重新发现传统信仰的文化意涵,使其与现代文明相衔接,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生命的神性与完整性,为人类灵魂建造安栖之地,赋予生命以尊严与意义

还活在祖先生命的延长线上,活在子孙慎终追远的纪念里。

在小说的开始,长命的父亲郭代道,深陷“恐症”的困扰,魏姑告知,这是因为郭家这一系的祖先郭子亥曾经历过灭族之痛,吓破了胆,只带了半个胆逃到此地,要治好郭父的“恐症”,便要带着先祖之魂回到家族的来源之地,将遗失的半个胆找回来,才能治好整个家族的胆小之症。在这一叙述里,个体深植于源远流长的家族血脉,前有祖先,后有子孙,人生有来龙,有去脉。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存在于世界,不只是为自己而活,而是活在祖先和子孙共同构成的生命链条中。死也不再是生的终结、意义的中断,不是走向虚无,而是作为漫长的前言与后记成为“生”的一部分。个体的短暂生命因此浑厚绵长,在瓜瓞绵绵、生生不息的“大我”式家族共同体中获得整体性的永恒意义。《论语》中说,未知生,焉知死?但这句话在此也可以反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只有真正理解与安妥“死”,我们才能懂得生的全部意义。

《长命》中要重建的正是生命的神性与中国式家族的血缘传统,赋予“生”宽广的厚度与绵长的深度。在小说的最后,魏姑被改造,变得“无神”,长命反倒开始“通神”。这里的通神,不是简单的巫术,而是在悠远的传统之上重建一种打通生死的信仰,使作为个体的现代人重新回到血缘共同体的温暖怀抱。长命在想象的世界里重铸那口毁坏已久的钟。钟声响起,唤回先人,唤回母亲,唤回与传统亲密的血脉联系,也唤回失落已久的生命的整体。生与死、子孙与祖先、个体与其所归属的共同体,在钟声里重新汇合、相聚。

中国现代新文化自发端至今已逾百年,理应到了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时候,也到了既知生也知死的时候。而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世俗压倒了神性,世间法成为唯一的法,“生”日益丰饶而“死”日渐贫瘠。失去了“死”的衬托,“生”的丰饶就只是物质的富足,当生命的神性消失,丰饶即是贫瘠。《长命》正是要在祛魅的时代寻求复魅的可能,重新发现传统信仰的文化意涵,使其与现代文明相衔接,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生命的神性与完整性,为人类灵魂建造安栖之地,赋予生命以尊严与意义。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短评

人性图谱 茶乡画卷

——评何正权长篇小说《茶道》

□周百义

何正权的长篇小说《茶道》洋溢着馥郁茶香,塑造了一群特色鲜明的茶人形象,勾勒了一幅隽美灵秀的信阳画卷,再现了当代茶乡追求幸福的奋斗精神。

《茶道》跨越了6000多年的历史空间,叙述了茶叶在信阳区域的引种、复兴和发展,以及信阳毛尖特色和品牌的形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片热土上,生长出许多发自内心热爱毛尖、以复兴毛尖为使命的茶人。作品通过几代信阳人在不同时代的奋斗,刻画出这一地域的人文精神、集体性格和时代面貌。其中,在茶山长大的孤儿白灵灵,历尽磨难,百折不挠,自强自爱,不仅成长为全国大赛榜首的“茶仙子”,更是胸怀复兴信阳毛尖、推广茶文化的梦想,带领乡亲们奋发向上,走向富裕。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具体的时代,但如何把现实生活的万千气象转化为文学作品里的典型时代环境,还得借助于艺术化的表达手段。《茶道》对信阳自然环境、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的解读别出心裁,颇有新意。沿着这个方法论和地域观,小说情节迤逦前行,通过一个个个性复杂、栩栩如生的人物,具体展现了信阳文化风物的千般色彩和万种风情。

文物是《茶道》最重要的叙述脉络。竹喧和自家绝世珍宝黄白玉观音之间的悲欢离合是一条主线。围绕主线,小说先后写到多种文物,展现了信阳丰厚的物质文化资源。在叙事结构上,小说采用了“我”(文物修复专家竹喧)、“你”(慧明,贤山书院女教师,即柳小蝶)和“他”的三重叙事视角,构建起一个复杂而立体的叙事迷宫。在人物对应关系上,小说中每个女性人物,都对应着一个能彰显人物个性的“宝贝”。比如,竹喧对应“骨笛”,白灵灵对应“十二先生”,慧明对应不见天目的“周典”……这些象征既预示了人物的命运,又映衬了人物的性格。

世界没有两枚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书写这其中的不同,就是文学作品的任务。《茶道》里的人物,在俗世里摸爬滚打、起伏沉浮,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作家用一个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让作品构筑起丰富多彩的文学人物世界。

作品以茶写人,所谓茶道,亦即人道。

(作者系作家、文艺评论家、出版家)

■新作快评

梦野中篇小说《土人人》,《中国作家·文学版》2025年第9期

在黄土沟壑间奏响生命强音
□陈昌平

作家梦野的中篇小说《土人人》以陕北大地为底色,铺展了一段关于民间艺术传承与生命羁绊的苍凉长卷,以颇具传奇色彩的民间艺人的坎坷遭遇,映照了历史转折时期的命运悲歌。

小说以徒弟寻找师傅为主线。梁梁这位从山西乌梁投奔师父的说书人,终其一生都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奔波与追寻,寻找师父留存的踪迹,打捞遗卷在黄土风沙中的师徒情义。而每一处关于“生存”的细节,又藏着人生的韧性:偷杏的窘迫里藏着饥饿年代的生存本能,与同行争夺说书舞台的逞勇斗狠映照着底层艺人的生存博弈,动荡年月的记忆刻下了时代的印迹。那些与师父、师弟相依为命的说书岁月,如三弦的琴音缠绕在梁梁的心头,有愧疚,也有忏悔,有救赎,更有升华。

梁梁寻师的漫漫长路,亦是对民间艺术精神根系的回溯。从折家庙的羊圈门到谷杆杆的公墓,从磨沙洼的荒沙到桃园山的土崖,每一处地貌都承载着说书人的足迹与心事。当登登师傅用香椿木自制三弦,当蛇皮与花线银丝在他手中化作传情的乐器,当《杨家将》《翻身记》的唱段在窑洞间回荡,陕北说书已不是简单的谋生技艺,而是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共同记录着百姓的苦乐,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维系着黄土高原上人与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结。即便是传销浪潮对艺人初心的短暂裹挟,或是八柱因生活困窘而失联的波折,都未曾斩断这份联结,反而让“土人人”对艺术的坚守更显珍贵。

作品将个人命运嵌入时代转折的宏大背景,以陕北的荒凉地貌映衬人物的坎坷遭遇,诗人的情致与质朴的方言交织出浓郁的地域气息,并以此建构了作品既拙朴又浪漫的美学风格。在苦难与温情的交错中,民间艺术的兴衰与传承,独照出人性的幽深与光辉,也折射出历史变迁中个体生命的沉浮,最终让“土人人”这一称谓超越了身份标识,成为黄土高原上坚韧生命力与文化根脉的坚毅象征。

当八柱的三弦在北京的舞台上奏响,梁梁将演出视频敬献于师傅墓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师徒间的情义延续,更是民间艺术在新时代的新生——它从黄土沟壑间走来,带着泥土的芬芳与生命的厚重,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继续奏响属于“土人人”的生命强音。

(作者系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



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和行走者,要有家国情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1995年,身为大学教师的我意识到扶贫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利用寒暑假自费走访国家级贫困县,采访数百人,创作描写扶贫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工作》。2002年,我受中国作协委派写西气东输工程,从新疆克拉2气田经过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江苏,到达上海白鹤镇,穿越黄河、淮河、长江,翻越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跋涉江南水网,与石油工人一起住工棚、吃盒饭,我经历过大漠风沙的侵袭,住过寒气逼人的新疆罗布泊小屋和克拉2气田板房,冒着40摄氏度高温站在江南烂泥塘观察焊工焊接管道,走了一万多里路,采访400多人,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动脉》。2006年,我应北京奥组委邀请,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公园采访运动员备战,先后采访了几百位奥运人士,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2008年,我用一个月的时间跑了汶川、北川、青川、绵竹、什邡、都江堰、彭州、安县8个地震重灾区,担任德阳东汽中学附属校辅导员,冒着余震、滑坡的危险创作了8篇抗震救灾题材报告文学和散文,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震不垮的川娃子》。2009年,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我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再次奔赴灾区,给孩子们演讲,鼓励他们自强不息。同年,我参加中国作家进警营活动,采访看守所、戒毒所和拘留所的相关人员,尔后,我又深入到全国十多家看守所继续深入采访,与200多位监管民警和200多位在押人员交谈,子夜冒着凛冽的寒风在看守所门口见证零点释放,春节与看守所监管民警一道给在押人员煮饺子,之后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看守所调查》。

2015年,我应北京市委宣传部邀请写北平抗战,深入到北京密云、延庆、门头沟、房山、平谷;河北涿州、赤城、兴隆、天津蓟县等地采访,有时就住在老乡家里搜集口述史,采访抗战老兵,支前模范,妇救会长,社会部、城工部、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的地下党员和日寇暴行的受害者,抢救性地挖掘抗战历史,留下了照片和采访笔记、录音等资料,出版了两部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北平抗战秘闻》。2018年,我走访北京冬奥会的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赛区。当时中国没有具备举办冬奥会水平的高山滑雪赛道、雪车雪橇赛道、滑雪大跳台,但冬奥会胸怀大局,迎难而上。延庆小海陀山海拔2198米,我去采访时没有路,汽车上不去,只能乘坐一辆四面透风的全地形车上升,从山脚下出发时艳阳高照,走到半山腰突然下起瓢泼大雨,道路泥泞不堪,差一点滑下去。赛道的建设者平均年龄30来岁,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建设的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赛道,是世界冬奥会历史上建设周期最短、难度最大、标准最高的工程,被国际雪联专家誉为“世界上最好的高山滑雪赛道之一”。山上零下20多摄氏度,别人过春节,我在延庆高山滑雪中心和雪车雪橇中心采访,与建设者一起吃盒饭。夜里是造雪最壮观的时刻,我和张家口赛区的建设者一道在雪场看造雪,一轮上升弦月挂在天边,纷纷扬扬的雪花颗粒扑打在脸上,凉飕飕的。我站在崇礼“雪如意”前采访中铁建工的建设者,鹅毛似的大雪在我们面前飞舞,看到建设者手冻得像胡萝卜,眉毛、睫毛上都是霜,我特别心疼。

后来,我到黑龙江和吉林采访冰雪运动。在哈尔滨采访速度滑冰、冰球和自由式滑雪时,当地体育局领导建议我去齐齐哈尔采访冰球运动,去七台河采访短道速滑。顺利完成了采访后,我本想赶回哈尔滨好好休息一下,又得知亚布力雪场次日有全国高山滑雪冠军赛,于是,又马不停蹄赶到亚布力雪场,抵达时天已经漆黑。当地人告诉我:“要想采访到高山滑雪全貌,必须三点钟起床。”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早,他说:“上午九点之前雪还结实可以滑,必须抢点儿赛,起先快吃饭,才能坐头班缆车上山。”当天晚上,冬奥健儿向我讲述了一些备赛的故事,临睡时已近子夜。三点钟,闹表一响,我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奔赴高山,羽绒服外面套上滑雪服还冻得瑟瑟发抖……比赛开始,运动员踏着雪板从山巅飞来,雪花四处飞溅,张扬着生命的活力。我精神抖擞地采访完高山滑雪和越野滑雪,才意识到自己几天几夜只睡了三个钟头。

北京赛区最亮眼的地标建筑是国家速滑馆和首钢滑雪大跳台。从黑龙江、吉林到北京,从北京赛区的“雪飞天”“冰丝带”,到延庆赛区的“雪飞燕”“雪游龙”,再到张家口赛区的“雪如意”“冰玉环”,每到一处冬奥建设工地和训练现场,我都与建设者、运动员、教练员推心置腹地深谈,先后采访200多人。4年来的“战役式采访”,让我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日新月异。最初,从北京市区到延庆采访要早晨5点起床赶路,到崇礼更是旅途艰辛。在奔波中我亲眼见证京礼高速和京张高铁的开通,一小时生活圈大大方便了百姓出行。延庆小海陀山这座其貌不扬的野山,在冬奥建设者的手中,于最短时间内建成了世界高水平高山滑雪赛道和雪车雪橇赛道。在河北张家口,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举办促进了京津冀一体化,改善了崇礼老百姓的生活,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为了建设延庆高山滑雪赛道,建设者移栽了24000棵树,竣工时做好了生态修复。北京冬奥会期间,风能和太阳能派上了用场,张家口的风点亮北京的灯,清洁能源助力北京冬奥会,在奥运史上首次实现所有场馆绿色电力全覆盖;以往点燃奥运火炬,排碳量大,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点火仪式以“微火”形式宣传双碳目标,大大减少碳排放。国家速滑馆、首都体育馆等新冰场都采用二氧化碳直冷制冰,碳排放趋近于零,不仅绿色环保,而且制冰质量好,低碳环保可持续成为一大亮点。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冬奥》就是这样在汗水和泪水间诞生的。

最近,我又把视点投向乡村教育和农村留守儿童,2018年,我应邀在江西老区建了老区工作室,住在农民家里调研,给农村留守儿童讲课,走访了江西十一个地级市70多个县市区近百所学校,采访了600人,今年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中篇报告文学《父母在远方,老师在身旁》。

新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幸运的,我们可以为人民立言,与祖国的建设者同行,为祖国的强盛讴歌;我们可以做光明的观察者、发现者、见证者。未来,报告文学作家们需要匍匐在祖国的大地,植根在人民中间,继续深入生活,提炼时代精神,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放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

■孙晶岩

行走与见证